

大馬旅台文學一九九〇

文·圖／陳大爲 國立臺北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

有關馬華文學在台灣的發展，已有多篇論文作了相當完整的宏觀陳述，「神州」往往是其中最醒目的焦點。事實上，自神州以降，每一代的馬華旅台作家，都是自由、自主、獨立的創作個體。觀察神州以後的大馬旅台文學發展境況，「大馬青年社」恐怕是唯一的觀察樣本，表面上看來沒什麼討論價值，資料極為匱乏，只能憑印象和有限的文獻來寫。其實它是有故事的。

有關馬華文學在台灣的發展，已經有多篇論文作了相當完整的宏觀陳述，「神州」往往是其中最醒目的焦點，不管正面或負面的評價，任何論者都很難繞過它。最主要的因素莫過於史料保存的完整性，以及它本身的傳奇性。以溫瑞安為首的神州詩社，是一個異常獨特的個案，嚴格來說，他們才是第一個馬華旅台的文學群體。比他們更早以結社方式活躍於台灣文壇的陳慧樺、王潤華、淡瑩等人，比較像是「結盟」形式的外僑詩社（迥異於神州以馬華詩人為骨幹的「結義」），到頭來還是單兵作戰，雖然整體創作成果比神州更勝一籌，卻沒有激盪出令人口耳相傳的故事。神州個案，已構成一個微歷史的研究，但它的封閉性很容易形成一種刻板印象——讓人誤以那就是馬華旅台作家群相濡以沫的典型。事實上，自神州以降，每一代的馬華旅台作家，都是自由、自主、獨立的創作個體，他們只是被客觀形勢湊在一塊，在文壇與學界的論述中打造成一個馬華品牌。不管是結社或結黨，都已經是陳年老事。比較糟糕的情況是：在某些不明究理的論述文章裡，原本各自為政的馬華作家被歸納成同一個樣式，共同使用一套創作歷程、心理，和故事背景，因而產生嚴重（或刻意？）的誤讀。

我們不妨選另一個樣本，來觀察神州以後的大馬旅台文學發展境況。

「大馬青年社」恐怕是唯一的觀察樣本，表面上看來沒什麼討論價值，但多年後回顧，卻有一些有趣的發現。這個社團隸屬於大馬旅台同學總會，每年獲得一筆活動經費，主要作為推動「大馬旅台文學獎」等藝文活動，以及編輯每年一期的《大馬青年》雜誌。在大馬旅台同學會的行政架構底下，它是一個文宣及言論功能取向的部門，一個純粹的大馬旅台學生跨校社團。

1989年夏天，也就是大一暑假時，我被大馬青年社的中文系學長邀約加入，也只當作參與一般的社團活動，完全沒有立志要進行什麼建國之大業或不朽之盛世。雖然我念的是中文系，但馬華文學在我的腦海裡是不存在的，生平第一部馬華（純）文學作品集，是黃錦樹在1988年12月送我的《龍哭千里》，當時我根本弄不清楚溫瑞安和神州是什麼東西。除了此書，我在大一時苦讀的三百本詩集和散文集，全是台灣文學作品。類似的閱讀趨勢，在大馬青年社的主力寫作者身上獲得廣泛的印證。（就我個人觀察所得，他們在現代文學下的苦功，遠遠超過台大中文系的本地同學，而且很快的拉開一大段距離。）



《大馬青年07》規劃有大馬旅台文學獎專輯，此文學競賽算是大馬同學的年度大事，投稿近百件。

由於青年社太自由，以致有點鬆散，究竟誰是社長，究竟有多少成員也說不清，有些人只是來客串編務，有些則偶爾出現在讀書會，跟一般大學社團沒什麼兩樣。這群散慢分子當中，包括了沉迷於楊牧散文的陳俊華和劉國奇、對書法與篆刻表現突出的林志敏和李乾耀（兩人目前任教於馬來西亞拉曼大學），回國後成為馬華在地作家的廖宏強和林惠州，以及最後留下來在大學任教的黃錦樹、鍾怡雯、我、吳龍川等4人。上述10人當中，7人住在台大男一舍，除了吃喝玩樂，就是埋首讀書。

這個社團的成員可說是當時大馬旅台生在文學創作上的菁英分子，台灣現代文學是大夥兒最主要的閱讀對象，尤其是楊牧作品，儼然成為小圈子裡的聖經，很多人書架上都有完整的一套楊牧（我也不例外，當然還加上眾多台灣重量級詩人的著作）。印象中除了黃錦樹，似乎沒有人閱讀或談論馬華文學，大陸新時期文學引進來的很有限，我們真正承接、吸收的是台灣現代文學。從這案例來看，我們這一代大馬旅台文學的形成跟馬華文學傳統關係不大，跟中國也很遠，可說是中華民國僑教政策底下最意外的豐收。我們的文學基因極大部分來自台灣文學，後來被收編



1990年6月，大馬青年社在《大馬青年08》出版後不久，就被大馬旅台總會中斷了金援，被迫關門大吉。

（或主動投誠）為「在台馬華文學」，也是合情合理之事。在大馬青年社成員的身上，可以清楚看見連結到台灣現代文學母體的臍帶，這是第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。

第二個現象，是對文學獎的熱衷。我對大馬旅台文學獎的初次接觸，來自《大馬青年07·（第六屆）大馬旅台文學獎專輯》，雖然那是小圈子裡的文學競賽（投稿近百件），也算是大馬同學的年度大事。文學競賽意識在大馬青年社裡相當濃烈，文學獎是相對公平的競技舞台，參賽得獎主要是為了獲得台灣評審的肯定和點評，對學徒期的旅台寫手而言，很重要。當時我們可以參加的文學獎包括：台大文學獎、師大文學獎等校園文學獎，以及某些地方性副刊和雜誌社舉辦的徵文比賽。不可忽略的，還是兩大報文學，那是很大的憧憬。我們正巧遇上台灣文壇的「文學獎盛世」，在1977至1987年間，商晚筠、李永平、張貴興、潘雨桐等4人，一共獲得12項次的兩大報小說獎，隱然形成一支大馬作家的得獎隊伍。接下來，就輪到馬來亞大學畢業後來台就讀研究所的林幸謙，以及台大畢業後返回新加坡的蔡深江，先後獲得1989年和1990年的中國時報散文獎，對大夥兒起了一定的激勵作用。大馬青年

社結束之後，這股參賽意識熊熊燃燒了近十年。自1989年至1999年，主要由林幸謙（散文）、鍾怡雯（散文）、陳大為（散文與新詩）、黃錦樹（小說）在十年間密集得獎，除了11項次的兩大報文學獎，還包括其他新設的文學大獎。第二階段的成果加上第一階段的累積，以及鮮明的赤道主題，強烈地形塑了馬華（在台）作家的群體形象。

第三個現象最為獨特，圈子裡總是瀰漫著一股知識分子意識，有好幾位學長都希望能夠考上研究所（說不定在潛意識裡都在期許自己將來能夠為大馬華社做些什麼）。我特別記得，有一次正在念研究所的曾慶豹學長來演講時，大家好像看到偶像似的十分興奮。「知識分子」這四個字，在當時大馬旅台同學心目中有著不可動搖的崇高地位。從《大馬青年》的內容可以看出，純文學是次要的，最重要的是知識分子的養成。旅台總會很重視對台灣僑教政策的省思，對馬來西亞種族關係和華人政黨的問題探討，一如黃錦樹在《大馬青年07·編輯室報告》裡所言：這本刊物的前四期，更強調「大馬青年意識」，強調對國家的關懷與了解，強調「使命感」（頁4）。在這一期，陳俊華寫了一篇談歷屆旅台文學得獎作品的文章，有一段話很有意思：「這一代的大馬旅台同學就是一群喝著混濁的湖水長大的知識份子。生活在這麼一個政治氣候陰晴難測的時代裡，大馬旅台知識份子背負著傳承中華文化的使命，披掛著僑生的外衣，來到台灣——這一塊彈丸之地、一個浩瀚博大的中華文化的縮影體——探求更高深的知識領域，他們的臉上有著遠比其他國家的大學生來得深厚的憂鬱氣質。或許這就是詭譎陰鬱的馬來西亞政治氣候所致，或許這就

是過早從上一代那裡感染到失望和不滿的結果」（頁7）。這番話聽起來好像是革命宣言，但它很生動、準確的傳達出那個年代的「大馬青年意識」。在早期的旅台得獎作品裡，確實表現出陳俊華所謂的知識分子意識。他的觀察，可以放大到整個大馬留學生圈子，尤其在當時的大馬旅台總會及其屬下的數十個分會的幹部之間，確實有這樣的氛圍。

馬來西亞華人社會一向都很重視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，馬來亞大學中文系的師生，被整個大馬華社賦予（或強行灌輸）一股任重道遠的使命感，彷彿將華社的興亡全交付給中文系的讀書人。這種很要命的「薪傳意識」，確實讓馬大學生心靈早熟，對旅台同學的催熟作用略低。當時我的世界只有純粹的現代文學，我不知道該具備什麼樣的知識水平才稱得上知識分子（也從來都沒想過要當），感覺上，比較像是具有社會運動色彩的文化評論人。在大馬旅台圈子裡，對華社的使命感確實存在，日常話題中經常談到「回去」之後的打算，或者「留下」來持續茁壯的企圖。這股使命感，不知不覺的滲透到文學創作裡頭，當我們開始關心馬華文學的時候，留學期間大量閱讀的台灣現代文學作品，自動成為馬華文學的對照，於是產生了後來的烽火。黃錦樹的燒芭行動，完全是可以理解的。那把火的背後，有使命。

1990年6月出版了《大馬青年08》之後不久，大馬青年社就被大馬旅台總會中斷了金援，被迫關門大吉。但它很湊巧的聚集過一批後來成為馬華重要作家的年輕寫手。嚴格說來，它並沒有真正造就過什麼人，成就過什麼大事，它僅僅

見證了幾位馬華作家的學徒期，以及那個時代的氛圍。

短命的大馬青年社，很反諷的象徵了旅台文學「結社時期」的終結。由始至終，這個社團只是大馬旅台同學會體制下的產物，這些年輕的校園寫手都沒有結社的興趣，權當作校園社團來玩，根本算不上「結社」，對我們而言，結社已經是舊時代的思維和產物。不過，很難避免的是，來自一代又一代旅台人和馬華社會的使命感，不時會從四面八方滲透進來，在日常言談之間相互感染，特別表現在習作之中。至於知識分子的養成，我們那批人都沒有成為華社慣常定義下的知識分子，我們只成為純粹的文學研究者，投入日後的馬華文學研究。

在過去四十幾年，三萬多名大馬旅台同學當中，先後培育出數十位成為馬華文學主力的作家，對他們來說，留學台灣的短短四年往往是整個創作生涯中最關鍵的階段，豐富的文學資源開拓了年輕寫手的文學視野，甚至決定了往後二、三十年的個人寫作風格。當然，要在四年間融入台灣社會是不可能的，只有極少數留下來繼續念研究所的同學，才有機會深入台灣。所以一代又一代的旅台寫手帶走了屬於他的台灣經驗，慢慢消化、融入日後的創作思維當中。說起台灣，總是一番緬懷與不捨。

在1990年代成為碩、博士研究生，持續在台灣的文學獎盛世中奮戰的，只有黃錦樹（1967-）、鍾怡雯（1969-）、陳大為（1969-）、吳龍川（1967-）、辛金順（1963-）5人。前3人在1990年代完成了文學獎的征途，在2000年以後鮮少主動參賽。近十年以來在文學獎方面表現最突

出的，首推第三屆皇冠大眾小說百萬首獎的張草（1972-），以及贏得第一屆溫世仁百萬武俠小說大獎的吳龍川，前者回大馬開業從醫（張草的創作質量都不錯，由於大馬身分不突出，所以經常被論者忽略），後者毅然辭去專任教職，留在中壢專心寫武俠小說。至於跟林幸謙（1963-）同屬「前六字輩」的辛金順，年少時即成名於大馬，來台後奮鬥了十餘年，終於在旅台的最後幾年拿下重要大獎，今年回大馬教書去了。

我們這些「大馬旅台作家」，在近年的學術論述中慢慢演化為「在台馬華作家」，有人說這是離散，有人說這是收編，也有人說我們始終擁抱著馬華主題，是因為無法融入台灣社會。其實每個旅台／在台作家都是一個特殊的個案，大家的生活經歷和創作生涯都大不相同，誰都不能成為典型。就我所了解的，從雜誌主編、補教老師、行銷業務、工地勞工、街頭工讀，都在旅台眾人現實生活的歷練之內，這麼多年下來，很難說跟台灣社會不能融合（反而有時回到馬來西亞，會感到些許的陌生）。馬華主題是很重要的原鄉書寫，這裡頭有很多過去的異國文化經驗是可遇不可求的，是創作的豐富礦層，不能就此斷言作家的土地情感和寫作意識。

馬華旅台／在台文學的問題很複雜，有些東西連我們自己都弄不清楚，看來有必要進行更細微的個案研究，才能一一廓清。以大馬青年社來說，資料極為匱乏，只能憑印象和有限的文獻來寫。其實它是有故事的。一部沒有故事，只有文學議題和創作文本的馬華文學史，何其乏味。作為1990年代馬華旅台文學的第一個切片，其中蘊含著許多值得探勘的細節。☒